

FuSiNian

●岳玉玺 李泉 马亮宽

·史海名流丛书·

□天津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

·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DaQiPangBoDeYiDaiXueRen



111
025
443

傅斯年

● 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B7B04/08

p 199 4, 9, 2 B

(津)新登字 001 号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岳玉玺 李泉 马亮宽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昌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 插页 27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1689-X/K·217

定 价:9.60 元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乘飞机赴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共建国内和平问题。图为他们抵达延安机场时,与前来迎接的中共领导人的合影。

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通先生、信州、快極！

看來先生還未發覺？
也許已熱鬧。也許就不熱鬧了。不過
初下月中旬。無論如何。總要少熱鬧了。
協和區各學校開年會。或者正不濟
巧。能延下月日那嗎？

初九日廿二。錢。打個電報。曰。
「來」便。不大熱鬧了。日。後。便。

傅斯年手迹(部分)

序

读傅斯年的传记，一个活生生的傅斯年先生的形象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出身儒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家经典。1913—1919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和本科后，受新思潮的熏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社，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扛着大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响应文学革新，提倡白话文。此后去英国和德国留学7年，学习心理学，涉猎英国哲学、历史、政治、文学，对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也颇感兴趣；接受德国史学大师郎克重史料、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归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开设“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延聘许多著名学人入所，也培养了大批青年学者。他学贯中西，渊博精深，融会乾嘉朴学和西方科学治学方法，在学术上建树丰硕。对先秦古史、诸子百家、古代典籍他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主持的《明实录》校证、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整理，便利了学者的使用，尤其对殷墟的发掘，更是对我国学术界一个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对自然科学的一些部门也是内行。他是专家，又是通人。

他还是一个教育家。这不仅因为他在大学任教多年，还因为

他对教育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主持过教育行政工作。他关心教育事业，对我国旧教育制度不满，认为教育界“呈现一种总崩溃的形势”。他主张教育应有独立性，行政长官不能以个人好恶干预学校事务；教师待遇应提高；学校应以职业训练为中心，使学生受到能力的训练，毕业后有服务社会的能力，课本知识要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受教育的机会要均等，使贫寒而好学的子弟也能升学；中小学的课程要减少，教科书要精简，要适合学生的年龄，使学生感到兴趣，要重视体育课。高等教育应引导学生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要设讲座，多设选修课，基础课应由最有学问与经验的教授担任；学习外国教育制度要根据我国情况“选择着学”等等。其中不少到今天仍值得借鉴。他晚年当台湾大学校长即实行他的主张，全力以赴，进行改革，把学校办得很出色。当有人说台大有“共产分子”或“亲共分子”时，他非常气愤，在报纸上著文反驳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指斥那些造谣者“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保持了大学不受当局干扰的独立地位。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他忧国忧民，对旧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暗、愚昧落后和贫富不均现象予以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对社会改造和思想革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曾赞成俄国的革命。虽然有理想的成份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表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东北地区，并叫嚷“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为了驳斥这一谰言，他联络几位学者撰写东北历史，并奋笔疾书了第一卷《东北史纲》，用丰富有力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还在1931年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撰文声讨日寇侵略，反对妥协投降，制造抗日舆论。1935年，日本鼓吹“华北五省自治”，引起北平教育界人士的公愤，北平市府的主要幕僚萧振瀛召集他们座谈，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

发对日不利言论，并以人身安全相威胁。傅先生义愤填膺，慷慨陈词，怒斥并警告汉奸亲日分子，使萧狼狈不堪。1945年8月10日，当他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欣喜若狂，跑到街上喝酒，见熟人即抱拳相贺，挑着帽子乱舞，结果手杖和帽子都丢了。比起当年杜甫在四川听到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状态恐怕还要激切天真。无怪乎他被称为“狂热的爱国者”了。

他生性豪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富于激情，爱发脾气。遇不平事，能仗义执言，无所顾忌。抗战时期，他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腐败无能极端痛恶，两次上书蒋介石揭露抨击之，虽无效果，仍不灰心，终于在参政会上以孔私分“美金公债案”公开提出质询，使蒋不得不把孔罢掉。宋子文继任院长后，他对之抱有幻想，曾著文表示支持，不久即发现其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资财手段不在孔祥熙之下，遂著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声讨之，使宋被迫辞职。孔、宋是蒋的姻亲，又深受蒋的信任，傅先生居然敢向他们开火，这种奋不顾身敢做敢当的精神和魄力，使当时人为之震惊。他写信给胡适解释他的所为是：“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认为自己的行动是“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这是实话。这是一个有正义感、对国家兴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多数人对他的行动感到痛快，朋友们为他担心，而有的人对他不理解，甚至说他是受人利用或哗众取宠。这是误解或有意中伤。以他的声望和才能，如能和当时的权贵们搞好关系或明哲保身，少说为佳，他完全可以做比史语所所长更大的官，然而他几次拒绝当国民党政府的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他对政府批评建议的自由。这和当时那些趋炎附势之徒，钻营奔走之辈相比，何啻云泥之别。他一生不从政，但一生中发表的政论文章却很多，从这一点看来，他称得起一个政论家。

从办《新潮》、参加“五·四”运动起，他便被认为是一个言论激进、不守本份的青年。他批判封建礼教，鼓吹个性解放，提倡科学精神，介绍西方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以后留学欧洲，进一步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他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赞扬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民主体制，否定旧中国的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但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和精华之处并未抛弃。上引“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是南宋文天祥就义前藏在衣带中的两句话（称《衣带赞》），他不仅以此自勉，还曾为他不满十岁的儿子仁轨（为纪念唐朝抗日名将刘仁轨而取此名）书写此赞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几首爱国诗篇，写跋嘱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以“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这完全是儒家的口吻。《衣带赞》开始就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孟子说的。可见他对于孔孟的立身为人之道是信守不渝的，这当然和他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有关。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多少志士仁人，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或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这是我们国家历经劫难而能巍然屹立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本书第七章第三部分结语说：“傅斯年是一个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名节意识的知识分子。”我想，这就是傅斯年之所以为傅斯年吧。

我从1935年旁听傅先生的“先秦史专题”开始，1938—1939年成为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外研究生，1939—1941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他兼所长，1944—1946年又在史语所工作两年。在断断续续的接触中，对他的为人和治学有良好的印象。再读本书，倍感亲切，从中还获取了以前不知或知之不详的许多信息，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这要感谢聊城师院几位同行的劳作。他们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傅先生的一生做了

· 细致的叙述和公允的分析评价,使这位一个时期以来在大陆默默无闻或被误解的学者、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恢复了他的本来面貌。这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的可喜成果。台湾学者对傅先生的事迹知之较详,盼望能对本书所记事实和分析提出意见,达到海峡两岸同胞对这一杰出学者的共识。这篇序言是对本书的摘要和个人感受,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也望读者不吝指出。

杨志玖

1993年8月1日

目 录

一、儒学世家新学子.....	(1)
1. 开代文章第一家	(1)
2. 老头子和小孩子	(6)
3. 出东昌府,闯天津卫	(12)
4. 国学大师的高足	(16)
5. 春雷惊醒寻旧梦	(22)
6. 创办新潮社	(26)
7. 在“五·四”运动大潮中	(35)
二、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41)
1. “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	(41)
2. 力倡白话文	(52)
3. 呼唤砸碎吃人社会的“狂人”	(65)
4. 社会革命:从鼓吹到反对	(75)
三、心血倾注史语所.....	(91)
1. 远离政治,潜心学术	(91)
2. 乱世英豪:史语所的栋梁	(103)
3. 史语所累累硕果	(114)
四、树立史料学派的大纛	(132)
1. “史学便是史料学”	(132)

2. 追寻“科学的东方学”	(142)
3. 与“化石的史学”决裂	(152)
五、古史领域的不同凡响	(163)
1. 稽古钩沉	(163)
2. 纵论诸子百家	(180)
3. 坟典新解	(195)
六、书生报国	(210)
1. 学人深知亡国恨	(210)
2. 御寇多见赤子情	(221)
3. 间关万里延安行	(236)
4. 联大北大行匆匆	(242)
七、浊世清流	(255)
1. 参政而不从政	(255)
2. 清正家风	(263)
3. 抨击时弊	(272)
4. 去留之间苦徘徊	(287)
八、师友交往录	(295)
1. 胡适：亦师亦友总相随	(295)
2. 陈寅恪：同学同事情谊深	(303)
3. 顾颉刚：半生挚友半生怨	(316)
4. 丁文江：由敌为友性情真	(324)
九、志在教育，殉身教育	(330)
1. 掷向旧教育制度的投枪	(330)

2. 为教育改革呐喊	(338)
3. 放言评说高等教育	(344)
4. 身殉台湾大学	(350)
附录:傅斯年生平著述简谱	(364)
后记.....	(379)

一、儒学世家新学子

1. 开代文章第一家

1896年3月26日，一个新生命降生在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里。他那31岁的父亲喜得贵子，52岁的祖父喜得嫡孙，自然分外高兴。全家喜庆之余，给这小生命起了名字，名曰斯年，表字孟真。正是这个小生命，后来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并逐渐为学术界所瞩目，最终成为驰名中外的学海名流。

傅斯年所降临的这个家庭，曾是鲁西的名门望族。当他来到这个家庭时，其院落依然如昔日那样宏阔庞大，黑漆大门上标志其门第显赫的“相府”及“状元及第”的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圣朝元老”的横书金匾及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也依然引人注目。然而，表面的气派毕竟遮掩不住日渐衰微的景象，大门外的旗杆已经朽腐倒落，院内的楼房瓦舍也多残旧破损，诸多的金字匾额皆因年久弗缮而脱漆退色，暗淡无光了。一切都在表明，这“相府”之家的权势地位已是今不如昔，家庭境况已在走下坡路了。

聊城傅氏的始祖名叫傅回，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永丰县）人，明朝成化年间来东昌府冠县出任县令，任满之后，他携四个儿子南归，另有三个儿子留居东昌：一子居冠县，一子居博平，一子傅祥定居聊城。

当时的聊城，经济、文化都甚发达，又是东昌府治所在，大运

河穿城东而过，北可通京师，南可达三吴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人们称聊城为“漕挽之咽喉”，“居天下之胸腹”。由于它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冀、晋、鲁地商贾云集之中枢，手工业与商业并相兴盛，是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达官显宦到此多登岸游息，鸿儒骚客常来此逗留，由此这里也成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卜居经济文化如此发达之地，傅祥及其子孙当然不会不受那种环境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作为县令的儿子，进士的后人，傅祥保持了书香门第的诗书传家之道，坚持督促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化，每每“口授章句”^①，并“引古人及郡先达”^②激励他们发奋苦读。同时，傅家处在聊城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不仅傅家子孙在学业上为当地人所尊崇，在经商方面也引人注目，经商致富，可说是傅家成为聊城大姓的原因之一。当然，在那个时代，家门的兴盛，更有赖于科举。

傅氏家族的飞黄腾达，肇基于傅回的七世孙傅以渐，他出生于万历己酉年（1609年），7岁入塾馆受四书，稍长则攻诗经、易经，习举子业。为求得功名，他投师于名儒孙兴就读。但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阉党专权，科场舞弊成风，直到35岁，傅以渐也未能博得任何功名。1644年，明朝灭亡，清廷入主北京。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求得汉族地主的支持与合作，清政府于入关后的第二年（1645年）便进行乡试，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得登贤书。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进士，殿试对策时又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遂授宏文院修撰，1654年累迁至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内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加少保。清朝顺治初年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其性质介于明朝的内阁与翰林院之间，每院只设大学士一人，傅以渐既荣居大学士之位，实际上已成为顺治初不是宰相

①②《傅氏族谱·碑文》。

的宰相。1658年阴历九月，顺治帝改内三院为内阁，授傅以渐以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之职衔，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顺治帝又颁发诰命，追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瑜、祖父天荣、父亲思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延及后代，成为鲁西之望族。

清人宋弼在《少保大学士傅公传》中记傅以渐的形象说：“公方面丰硕，颧下多髯，伟腰大腹”^①，耿贤举的《傅公家传》也说：“公丰额重颐，方面垂耳，须生颧下，伟腰腹”^②。我们拿这些记述与傅斯年先生的照片画像两相比较，很容易发现，傅斯年与其七世祖傅以渐的形体、相貌何其相似乃尔。不过，傅斯年终生从不向别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这是因为，在傅斯年看来，傅以渐在明清两代易鼎之际，竟与满清合作，是有损民族气节的。

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科场得意者不乏其人，乡试中举者有之，会试进士及第者亦有之，至于为庠生及太学生者，则不下百余人。他们之中，在朝为郎官者有之，出任巡抚为封疆大吏者有之，任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傅氏一门，真可谓贵且富矣。但至傅斯年的祖父傅淦这一代，其家境便开始衰萎而窘迫了。

傅淦，字笠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生。他少负才名，博通经史，文武兼备；尤精诗文书画，为聊城县学生员之佼佼者。咸丰辛酉（1861年），正逢12年一度的选拔贡生之秋，年仅17岁的傅淦被教公正选为拔贡。按清制规定，凡拔贡皆可被贡诸京师，参加朝考，优者可出任七品京官，次者可出任知县，三等的可任教职。凭着傅淦的才学，加上他的家世声望，如果他参加朝考，得个

①②《傅氏族谱·传》。

七品京官或七品知县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他绝意仕途，终生不肯参加科试。不少人解释他不入仕途的原因是因他“淡泊功名”，其实，他之所以作此选择，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他 15 岁那年，父亲去世，其生母张氏循封建旧俗，绝食殉节，留下他兄弟七人相依为命。傅淦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他的四个弟弟皆在童冲之年。世称傅淦好交游，好周济穷人，赴义唯恐人后。他对别人尚能如此关心，又怎能抛下自己的弟弟不管，而去耗费川资入京朝考呢？后来，他抚育诸弟长大成人，析籍分家时，他把 12 座楼房全都让给了诸兄弟，自己则只要了一座马厰。仅此一举，足以表现出其谦恭退让之气度了。傅斯年一生在经济上乐于关心照顾亲友子侄、同事学生，与其祖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傅淦 19 岁娶陈梅为妻。陈梅是山东潍县陈阡之女，陈阡官至江西巡抚，他给女儿的陪嫁之物甚丰。但是，傅淦只有文才，缺乏持家理财之道，分家之后，坐吃山空。他 22 岁那年，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子、三子相继出生，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渐趋贫困。为生活计，他不得不违心外出寻求一个谋生的职业。他的父亲傅继勋曾在安徽做地方官 20 余年，后来升为布政使，李鸿章、丁宝桢等都是他的门生。1883 年 7 月，李鸿章升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来信叫傅淦去天津，打算给他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立刻赶到天津，适值李鸿章忙于公务，未能立即接见，傅淦便以为有意慢待自己，第二天便一怒而去，自此在家不再外游。他在家乡靠教塾馆挣些银钱养家糊口，有时卖字画换些银两贴补家计。如此仍难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靠变卖夫人陈氏的嫁妆度过难关，陈夫人的陪嫁之物虽多，但不久几年也典当一空了。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66 年生，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业，光绪甲午（1894 年）乡试中举，但亦未入仕途。因家境日窘，为全家生活计，穷举人傅旭安于 1899 年离开家乡，去山东东平